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工人與黨國體制：台灣新傳統主義的形成與轉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2-H-343-003-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何明修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7 月 24 日

就如同其他的社會運動一樣，工會運動不只是一種爭取權益的集體行動，同時也意味著一套世界觀，或者說是，一種觀察與詮釋外在世界的方式。在特定世界觀的引導下，現實被賦與了意義，不同的元素也獲得了相異的評價。社會運動中所共享的世界觀指認出，那些人是屬於同一個群體、他們具那些應有的權利、誰又是共同的敵人。很顯然，任何運動都不可能完全憑空杜撰，形塑出屬於他們的運動世界觀；無論運動本身是如何地具有革命性格，要求徹底否定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都需要從既有的文化觀念出發，將其修改、延伸使用、重新組合，以提出一套能夠正當化運動目標的說法。一個科學哲學的比喻可以用來說明這種情況(Neurath 1952: 47)：要修正一組既有的理論就如同在大海航行途中進行船體的修理，只能用現有的零件來取代受損的部分，一邊進行修補，一邊同時維持航行。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可能將航程擱置，直接靠岸修理；同樣地，要推動一項社會運動的出現，也不可能回歸到文化的零點，一切重新開始。

八〇年代以降，儘管工人抗爭與組織化的事件層出不窮，工運的政治實力也不斷在提升之中，但是卻一直**缺乏強而有力的文化傳統支援**。趙剛(1995: 145)觀察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他指出台灣的工人欠缺有力的「反抗次文化」，「與豐厚的權利論述和階級衝突的傳承的西方社會不可同日而語」。同樣地，一位工會運動者也表示，每次去韓國訪問，他們的工會領導人都會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壓迫開始講起，但是台灣的工會代表卻無法提出類似的歷史想像。³

從工人如何描述自身的境遇，也可以發現他們所採用的語言是充滿了傳統社會的圖像，缺乏長期浸潤工業生活的經驗。一位遠東化纖的工會幹部曾指出：

「雇工播種耕田，主人不惜花費，準備精美可口的飲食招待，不惜付給他們優厚的薪資，這並不是主人愛護這些傭工，只是他們認為這樣做，傭工會更賣力耕田，更努力除草。而傭工這方面呢？盡力地耕田除草，並不是愛主人，而是想這麼努力工作，飯菜就可以更精美，錢也可以比較多，僱主這方面提供優厚，傭工那方面是賣力做事，各盡其心，各得利益，這都是存在自我打算的心理，終究自利利人」。⁴

同樣地，一位翠華公司的員工也曾如此批判主管的專斷：

「『吃人頭路，領人薪水，吃呼肥肥，假呼錘錘』！古時愚忠的奴工總認命於主人威權壓榨、剝削之下。盡義務卻不能享權利，凡事只求隱忍無爭。是故『故人的苦勞仔，有耳無嘴』」(翠華工會第一分會 1994: 76)。

值得注意的是，工人是採取前現代的剝削形式(傭工、奴工)，來理解資本主義的現實。他們似乎**缺乏一套符合現代情境的詞彙**，來批判自身的社會處境。研究者指出，八〇年代的工運並非由剛接觸工業文明的第一代工人所發動的，而是以所謂的第二代工人為主力部隊(Hsiao 1992)。儘管如此，**農業時期的社會圖像**

³ 私下談話，2005/4/27。

⁴ 引自《化纖總廠工會會刊》2(1987):2

仍是普遍被接受的，而且用來充當公平正義的標準，因此，不少受到剝削的勞工就將自己比喻成爲牛。舉例而言，在 1987 年，糖廠員工的串連與抗議被描述爲「台糖牛也會生氣」(陳進明 1989)。在 1992 年，台塑仁武廠工會以「我們是人、不是牛」的文宣，反對公司的職務調動。⁵在 1995 年，高雄的郵務工會以「郵差不是牛」的口號，抗議工作量過重。⁶有些時候，只要雇主的表現稍微符合了「地主與長工之間的情義對待」的規範，階級關係所引發的緊張也會被掩蓋住，而不會形成全面性的對抗(郭慧英 1997: 116)。

在本研究所關切的翠華工會中，一位工人也在工會會刊中提到：

「xxx廠長時代故意把雇用人員稱爲工友引起『賭爛』，經過不斷爭取改名，到他當廠長末期爭取到連技術工都不要，改爲技術員，接著連監工也不要，改爲監造員。當時我心裡想，工字仍然沒有出頭呀！這是客家農民『望天撈食』的俗語吧！」⁷

換言之，台灣工人似乎找不到符合他們時代的語言，仍是沿襲著過時的社會圖像。爲何台灣的工人運動是處於如此貧瘠的文化狀態？到底是什麼歷史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在工運的起步階段，又得要依賴何種替代性文化資源？

不可否認地，長期的政治威權主義窄化了工人，甚至是一般人民的文化想像，排除了其他能夠訴諸草根的批判性論述。二〇年代出現的政治改革運動與左翼思潮曾經一時興盛，但是在三〇年代中期總督府的戰時動員體制下，這些反對勢力不是被打壓，即被總督府收編而消解(林繼文 1991: 70-77)。二〇年代中期以後蜂起抗議的工匠工人(artisan workers)，也在後來三〇年代的軍備工業化政策下，被轉化成爲工場工人(factory workers)，喪失了抗爭的能量(廖偉程 1994)。在戰後的威權統治下，這些殖民地時期的激進主義成爲了被遺忘的傳統遺產。

在抵抗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的掠奪過程中，也曾出現多起的工人罷工，反對擁有特權的外省人佔據日本人所遺留下的職缺(張國興 1991: 419-420)。在 1947 年的二二八事變中，工人們要求合理的人事制度、反對國民政府的資源掠奪也是公開的訴求之一。然而，在國民政府血腥的鎮壓之下，帶頭的異議工人被屠殺、監禁、革職，結果使得工人們喪失基層的領導人才。五〇年代之後，黨國體制開始進駐工廠，一方面，以保防、人二、廠警等安全控制機制，鎮壓工廠內部的異議人士；另一方面，隨著黨部、工會、福利會等組織的建立，效忠政權的工人開始獲得黨國待從主義體制所分配出來的恩惠(林宗弘 1999: 60-65)。總結來說，強力的威權壓制使得台灣工人喪失了原有的反抗傳統，也斷送了他們自發性創造批判文化之可能性。

七〇年代初期出現了新一波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表現在大學生下鄉服務，與知識份子刊物(如《大學雜誌》)對於社會問題的辯論(李丁讚 2005: 32-34)。儘管如此，這些知識份子的介入仍是帶有高度的傳統士人色彩：他們是以社會的

⁵ 引自《勞動者》57(1992):22。

⁶ 引自《勞動者》74(1995)19。

⁷ 引自《翠華工會第一分會會刊》74(1998): 2。

良心自居，即使他們是為工農大眾代言，但是仍缺乏實際的行動，試圖將群眾納入追求社會改革的行列(Huang 1976: 103-104)。在七〇年代後期，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開始帶有政治批判的色彩。在《夏潮》、《美麗島》等雜誌中，出現了一些工人處境的報導，其評論往往是點出帝國主義、政治高壓等結構面向的問題。然而，在這個時期知識份子與工人的有機連帶並沒有被建立，也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政治批判曾經對於工人讀者發揮了啟發性的作用。

八〇年代初期，黨外運動從美麗島事件的鎮壓重新出發。隨著黨外雜誌的流傳，選舉演講的尺度開放，政治反對運動的訴求開始獲得了更廣大的影響力。根據范雲(2000)的研究，大部分的早期工會運動幹部是受到了黨外言論的啟發，他們的參與是從外在的政治選舉轉向內部的工會組織，因此出現了「政治人到階級人」的轉變。換言之，黨外所提出來的政治批判成為八〇年代末期工運興起的文化資源。在此，黨外的訴求及其影響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兩點。首先，反對運動**批判畸形的黨國體制**，黨組織寄生於各種政府機關與社會組織，並且阻礙了人民的結社自由。對於工人而言，這項批判很容易產生共鳴的，原因在於既有的產業黨部一方面把持了工會組織，使得基層的聲音無法獲得呈現；另一方面，黨國侍從主義也有系統性施恩給黨籍員工，使得他們享有考績、升遷、調職、公司福利等各方面的特權。在工廠內部，反黨國的論述正當化了工會自主化的訴求，基層工人們開始進行串連，打破黨部對於工會的長期壟斷。

到了八〇年代末期，反對派的**台灣民族主義**色彩開始抬頭(王甫昌 1996: 185)。透過一系列的政治動員，「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被用來批判外省人的政治壟斷，以及中國法統對於政治管道的限制。在國營事業內部，這種族群動員的口號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共鳴。自從國民政府沒收日本人遺留的工業資產，外省人大量地取代原先日本人的管理階層位置，不平等的族群分工現象被保留下來。後續的黨國侍從主義更是強化了族群對立，由於黨員大部分是外省人，黨國的特權恩賜也多半流向外省籍員工。早在自主工運興起之前，一個明顯的族群界線就表現在語言使用：辦公室是講國語，而操作現場則是講台語，夾雜著日語的專門術語。因此，「台灣人出頭天」的訴求也可以轉化成為工人團結的口號，共同向外省人為主黨部宣戰，企圖取得工會的主導權。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台灣工會運動所能援用的文化資源非常有限，缺乏更深遠的歷史傳統。第一波的工運只能直接借用政治反對運動的訴求，將反黨國與族群動員的論述從選舉演講台帶入工廠廠房，掌握工會機器的動員也被理解為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戰線之一。這些借來的論述固然支撐起八〇年代末期基層工人抗爭的能量，但是其動員作用是受到高度的限制，甚至反而會帶來分化的效果。誠然，批判黨國體制的論述能帶來一定程度的認知解放作用，工會是屬於工人的，而不是屬於國民黨的；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工人透過選舉動員，擊敗了黨部所推出的候選人，工人所掌控的工會下一步是什麼，卻沒有任何的線索。寄生於工廠的黨國體制強化了工人的政治從屬地位，但是就本身而言，並不是導致階級支配的主因。這也就是說，**反黨國的論述正當化了工會自主化的訴求，但是自**

主的工會要如何定位自身的路線仍是一個未回答的問題。

族群動員雖然喚起大部分本省籍工人被壓迫的經驗，但是對於他們身旁的外省籍同事，卻反而產生了排斥的反動員效果。有證據顯示，族群政治的陰影持續地影響了工會運動的路線，至少在翠華公司的個案中，就曾出現這種情況。在1993年，國民黨首度任命一位本省籍政治人物擔任翠華公司的董事長，這項任命案引發了翠華公司內部外省籍的高層主管不滿，因此以總經理經爲主的外省勢力暗中結合部分工會幹部，共同以反民營化的口號進行抵制行動。就某種程度而言，這項衝突是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的延伸。因此，反對派的口號是「找回民生主義」，這項訴求一方面是訴求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神主牌，另一方面則是要回到以往外省掛當道的年代。在此時，工會內部出現了路線上的爭議，反民營化亦或是本土化那一項是優先，到底要抗議本省籍的董事長亦或是外省籍的總經理？在這一段時間，工會內部出現嚴重的路線與派系的鬥爭，反而減弱了共同的反民營化訴求。⁸

因此，反黨國與族群的訴求是有明顯瑕疵的動員工具，雖然能取得基層工人一定程度的認同，但是同時也帶來更嚴重的分化效果。在缺乏其他更有利的論述下，工人只得轉向更原始的、素樸的文化資源，來建構他們的階級團結與參與動機。⁹

⁸ 相關的報導，見自立早報 1993/5/22，工商時報 1993/5/21。

⁹ 在此，筆者並不是主張某種版本的階級優位性，其他的社會分類只是次要的。階級運動依賴某種性別文化；同樣地，如同性別運動有可能借用某些階級文化，例如王雅各(1999: 62)指出，台灣八〇年代的婦運開創者都具有類似的專業中產階級背景。因此，重點在於解釋社會運動為何需要特定群體的文化，而不在於宣稱那一類分類是本質。